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值班责编：李牧鸣 刘小草  
邮箱：worthreading01@163.com 电话：(010) 88051377

# “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

河南巩义重大考古发现或颠覆“中原的中心地位是从夏代才开始的”这一认知

●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国宝级的文物——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最早丝绸实物、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宏大的建筑规模，前殿后寝的格局，包括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的关联，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材料，也表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河洛古国的发现，可能将改变“中原的中心地位是从夏代才开始的”这一认知

本报记者王丁、桂娟、双瑞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流域的河洛地区，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说法，向来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腹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使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的存在得到证实，近年新发现的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把人们的目光带向更遥远的过去。

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郑州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等知名专家学者参加发布并做点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材料，也表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确是黄河文化之根。”王巍表示。

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经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连续多年考古发掘，确认其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专家们一致认为，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初期阶段，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其社会发展模式、承载的思想观念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五千年中华文明正是赖此主根脉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 中华文明主根脉五千多年不断

尽管已实地考察数次，83岁的李伯谦仍不舍得错过任何一次近距离查看河洛古国细节的机会。春夏之交，炎热感已十分明显，老先生在地势高低不平的遗址区来回奔走，看起来殊为不易。

“我来六七次了，今天看了还是挺激动，真是太重要了。”他兴致很高，同行的其他学者亦是如此，频频相互交流意见。作为备受推崇的权威专家，他们走遍大江南北，看过的文明古迹不计其数，但对河洛古国青眼有加，原因在于河洛古国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时15年，在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地都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高等级都邑遗址，显示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倾向，但中原地区却没有此阶段的重大发现，给人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甚至出现了“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

“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不是实际情况，黄帝的活动区域应该以河南为中心，所以鼓励一些机构开展相关研究。令人欣慰的是，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材料，也表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 北斗九星背后的奥妙

关于河洛古国，顾万发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处遗迹的发现，也是他的得意之作，几位了解个中详情的同行常有感佩之语，“要是在别人手里，很可能就错过了”。

49岁的顾万发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的发掘领队。在发掘过程中，他注重对天文、祭祀、宗教、礼制等“形而上”遗迹现象的研究，得到专家们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等认为，精神文明的考古过去长期被忽视，它恰恰是体现中华文明特质的最重要方面。

在双槐树遗址的中心居址区内，记者看到了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陶罐埋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考古人员一一贴上了数字标号。如果没有顾万发深入浅出又妙趣横生的讲解，很难想象这看似平淡无奇的场景所蕴含



▲2019年8月27日无人机拍摄的双槐树遗址。 本报记者李安摄



▲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遗迹(2019年8月27日摄)。 本报记者李安摄



▲牙雕家蚕。 由受访者供图

的无穷奥妙。“北斗九星遗迹有政治礼仪功能，主人借此神化自己，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也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顾万发如此概括，背后丰富的细节却比这句严谨的总结有趣得多。首先需要明白北斗九星天文遗迹所处的特殊

位置。遗址的中心居址区可以简单理解为贵族居住的区域，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尤其是围墙东端的造型，非常特殊，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瓮城是古代城市的主要防御设施之一，通常是在城外或内城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河洛古国的中心居址区已有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可见居住者非同一般。这里发现有4排大型房址，房址之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一个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摆成北斗星形状的九个陶罐就是在这所房子前面的门廊发现的。

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北极附近——古人认为北极是天的中心，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麋鹿在古人眼里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古代有天子冬至祭天的传统，大部分鹿类在夏天脱角，只有麋鹿在冬至脱角，所以统治者把麋鹿脱角视为吉祥的象征，并把麋鹿与一年最重要的节气冬至关联。此外，道教有“三跨”的说法，指龙虎鹿三神兽，它们是帮助神巫上天的桥。顾万发认为，麋鹿也应有鹿蹄的意思。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5000多年前的画面：九个陶罐和麋鹿都埋在地下，当房子建成后，居住的主人日常活动时，就仿佛骑在麋鹿身上，向下诸部落氏族表达自己才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专家推测，这应该是一位有地位并且谙习巫术和天文的古国首领，以这种方式设计自己的居室实际是在首肯自己。

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的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其中一颗如今已看不到的星，专家推测可能是景星，即超新星。《河图》记载：“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也。”也就是说，在北斗附近出现景星的时候是黄帝治理天下的繁盛时代。这九个陶罐，有可能记录了一次超新星爆发，目前相关研究还在进行中，如果情况属实，将对世界天文学史的巨大贡献。

顾万发及其团队之所以能顺利确认北斗九星遗迹，离不开他主持发掘的另一处遗址——青台遗址，那里也发现有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青台遗址位于河南荥阳，与河洛古国属于时代近似的文化遗存，发现的“北斗九星”标志物大小与天体实际亮度基本一致，用现代天文学软件演示，位置也非常精确。同时还存在北斗九星祭祀区，尤为重要是还发现了圈丘形天坛遗迹，殊为难得。

专家们认为，双槐树遗址连同青台的“北斗九星”遗迹、天坛圈丘及有关建筑，既是科学的天文遗迹，也明显具有特殊的人文含义。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 农桑文明史的最早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中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与青台遗址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

养蚕缫丝。这件艺术品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它的做工十分精致，腹足、胸足、头部组合明晰，和现代的家蚕极为相似，同时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与蚕吐丝或即将吐丝时的造型高度契合。

这是迄今发现的仰韶时期与养蚕及丝绸起源相关联的、比较直观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牙雕蚕的发现，对顾万发而言别具意义，因为双槐树遗址的发掘初衷就是寻找丝绸之源。

“丝绸和玉都是中华文明的高端代表，关于玉的研究和发现很多，丝绸少有人关注。丝绸这种高科技产品的产生，一定有相应的社会理念和人力物力财力做支撑，背后肯定有更高端的文明存在，如果找到了，所谓‘中原文明洼地’的问题就解决了。”顾万发说，他不相信距今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没东西，从气候、环境、资源和传说等各方面看都没道理。

正是在这种理念驱使下，加上从考古科研角度呼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起，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考古发掘项目，对郑州周边相关遗址进行全面的调查勘探与考古发掘工作。

随着河南荥阳的青台遗址、郑州西南郊区的黄岗寺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等一系列仰韶文化城址被发现，一个具有早期城市性质的大型聚落集团面貌逐渐清晰，形成了黄帝时期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核心地区。

不久前，研究人员在汪沟遗址出土瓮棺里的头盖骨附着物和瓮底土样中，检测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桑蚕丝残留物，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织品，令学术界大为振奋。

这些丝绸是用来包裹亡童下葬的。事实上，郑州地区的仰韶文化聚落群发现好几处蚕茧，裹着孩童放在瓮棺里。为什么死后要裹蚕衣？因为当时的人们希望死后像蚕破茧飞天一样复活。孩童的瓮棺也多为小口尖底瓶，形似蚕蛹，体现了先民对蚕神的崇拜。

“谁都想死了以后变神仙，中华文明古老朴素的修行思想在这个时候相对成熟了，先民有了重生的精神追求，并且想办法去实现。”顾万发推测，也许正是因为原始崇拜，先民才会去驯化野蚕，使用蚕丝，牙雕蚕说明他们已非常熟悉蚕的生长习性。

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丝绸技术已趋于成熟。在汪沟遗址的出土残片中，有一块“绛罗绸绢”中的罗织物，且经过染色处理。为防止掉色，先民对这块染色罗进行脱胶，生丝脱胶后称熟丝，这块罗也是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熟丝丝织品。

其实，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全国许多地方都开始关注蚕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发掘出半个蚕茧，河南省淅川县下王岗遗址，曾出土陶捏的蚕蛹；陕西宝鸡的一处遗址还发现了陶器上的彩绘蚕。而中原地区不仅关注蚕，还关注蚕茧。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除了双槐树为首的聚落，全国其他地方却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李伯谦认为，从这一角度看，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对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 墓葬区透露的文明发展模式

河洛古国还发现许多被后世承袭的文化传统或社会观念，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曾中断。遗址内发现了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其中一个墓葬区早期主体被遗址外壕和中壕及一条围沟围成一个独立的区域，应是中国早期帝王陵寝兆域制度的雏形。

发掘单位已与北京大学等12个权威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对人的来源、疾病、迁徙、食谱、人地关系、古DNA等问题予以研究。专家们认为，对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处在文明起源关键时间阶段、位于黄河流域中心区域的聚落集团的人的问题的综合研究，将为华夏民族的核心族系起源问题提供最为丰富的单体资料。

目前，初步获得一些有趣的发现，生活在这里的男性基本不干活体力活，因为上肢骨不发达。同时，男性的基因稳定一致，而女性的基因来源非常广泛复杂，由此不难产生一些大胆的联想。

“更特别的是，双槐树遗址的墓葬区里葬品很少，即使墓葬规模很大、等级很高，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特例。”顾万发说，这可能跟中原地区的丧葬思想有关，首领掌握军事权和祭祀权，但宗教色彩不浓郁，不主张把生前的东西带到死后世界，这也是其延续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

(下转10版)